

DANG DAI ZHONG GUO MA KE SI ZHU YI DA ZHONG HUA DE TIAO ZHAN YU LU JING YAN JIU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挑战与路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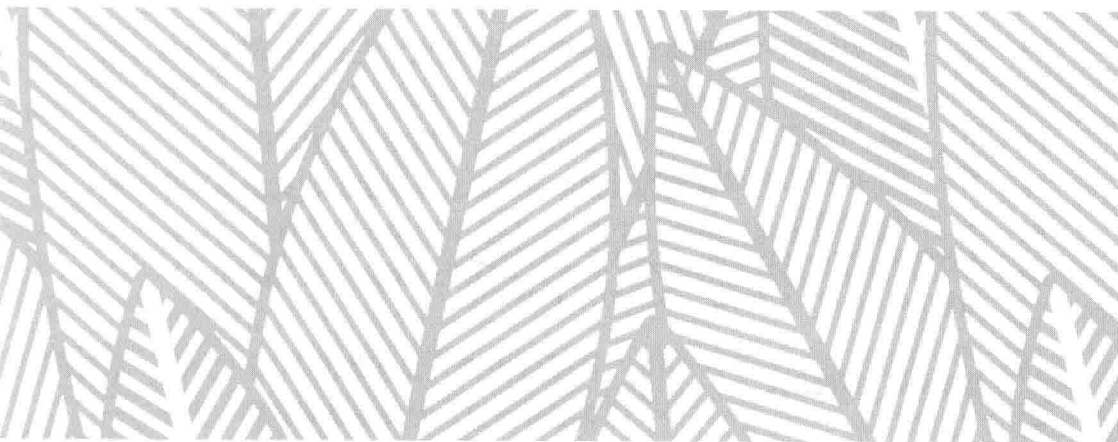
何玲玲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挑战与路径研究

何玲玲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与路径研究 / 何玲玲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01-012605-0

I. ①当… II. ①何… III. 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6204号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与路径研究

DANGDAI ZHONGGUO MAKESIZHUYI DAZHONGHUA DE TIAOZHAN YU LUJING
YANJIU

著 者：何玲玲

责任编辑：陈鹏鸣 翟金明

出版发行：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3年10月 第1版

印 次：2013年10月 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9.5

字 数：345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12605-0

定 价：48.00元

发行电话：(010) 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

销售中心：(010) 65250042 65273937 652895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08CKS003）研究成果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挑战与对策——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目 录

导论	1
一、问题的缘起	1
(一)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
(二) 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5
(三) 改革开放时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7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现状述评	12
(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现状	12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评析	29
三、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32
(一) 研究方法	33
(二) 基本思路	34
第一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概述	35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背景	35
(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国际背景	35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国内背景	40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与特点	44
(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44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	49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51
(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52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紧迫性	55
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57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和基础	58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和结果	59
第二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石	61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基石	62

(一)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科学品质·····	62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蕴含的科学品质、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	67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基石·····	72
(一) 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品格·····	73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	76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群众基石·····	81
(一)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群众性理论特质·····	81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84
第三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与挑战分析·····	89
一、调研的基本情况·····	89
(一) 调研方式·····	89
(二) 调研地区·····	90
(三) 样本情况·····	91
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定位·····	93
(一)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定位·····	93
(二)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定位·····	95
(三)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定位·····	99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主要成效·····	103
(一) 初步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103
(二) 较为认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大众化·····	107
(三) 积极参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	111
(四) 基本建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任·····	114
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117
(一) 部分大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入了解·····	117
(二) 部分大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较为淡薄·····	124
(三) 部分大众践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较弱·····	126
(四) 部分大众缺乏马克思主义信仰·····	131
第四章 共产党员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与挑战分析·····	137
一、样本的基本情况·····	137
二、共产党员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定位·····	139

(一) 共产党员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定位	140
(二) 共产党员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定位	144
(三) 共产党员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定位	147
三、共产党员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成效	149
(一)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了解较深	149
(二)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情感深厚	151
(三) 积极践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153
(四) 坚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156
四、共产党员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挑战	157
(一) 部分党员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不深	158
(二) 部分党员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情感淡薄	167
(三) 部分党员践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力	172
(四) 部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出现动摇或改变	178
第五章 普通群众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与挑战分析	185
一、样本的基本情况	185
二、普通群众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定位	187
(一) 普通群众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定位	187
(二) 普通群众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定位	190
(三) 普通群众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定位	192
三、普通群众中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成效	195
(一) 初步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195
(二) 较为支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	199
(三) 初步运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于具体实践	203
(四) 初步建立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信任	206
四、普通群众中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挑战	208
(一) 部分群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了解不够全面深入	208
(二) 部分群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较为淡薄	210
(三) 部分群众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践行状况不佳	214
(四) 部分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信任感呈逐渐弱化趋势	218
第六章 大学生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效与挑战分析	221
一、样本的基本情况	221

二、大学生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定位	222
(一) 大学生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价值定位	222
(二) 大学生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定位	227
(三) 大学生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条件定位	230
三、大学生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成效	233
(一)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认知较好	233
(二) 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情感较深	240
(三) 多数大学生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	245
(四) 多数大学生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	249
四、大学生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挑战	252
(一) 部分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客观认知水平较低	252
(二) 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较淡薄	255
(三) 部分大学生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不佳	257
(四) 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缺乏足够信任	260
 第七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因素及路径分析	263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263
(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同大众存在“距离感”	263
(二) 部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动摇	265
(三) 不良社会思潮的监管机制尚不健全	266
(四) 部分社会阶层未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267
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267
(一) 树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念	268
(二) 变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形式	270
(三) 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推进其中国化	277
(四) 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队伍	282
(五) 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对的“大众”	286
(六) 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具体政策相互转化	289
 参考文献	293
 后记	302

导论

在 21 世纪之初，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进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相继出现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行。在此历史境遇中，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and 支配作用遭遇新挑战，要求积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焕发理论生命力，夯实群众基础，指导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马克思主义如影随形的两大基本实践活动，也是必须长期关注和推进的历史任务。

一、问题的缘起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两个不可分割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必然迫切要求积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考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传播历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与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三个阶段。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早在 19 世纪末，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就将马克思及其部分思想介绍到中国，但此时不足以称有何重大影响，只是被作为西方的一种思潮进行介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开始扩大影响的契机是 1915 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开化思想、开启民智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知识分

子和爱国青年中传播开辟了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一步一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跨出国门，寻求救国救民良药。一时之间，来自国外的各种“主义”和思潮涌入国内，彼此进行论争，又与封建主义思想针锋相对。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以此为阵地，凝聚了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精英，在“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下掀起了倡导新道德和新文学，反对封建专制和愚昧迷信的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虽然存在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但“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这就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大范围内传播提供了历史机遇。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灾难性后果的激发，俄国工人、士兵和革命群众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反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鼓舞了在黑暗中徘徊、探索救国道路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群众，为马克思主义从各种“主义”和“思潮”中脱颖而出提供了有力支撑。

1919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身份以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公然瓜分战败国在中国的权益，侵犯中国主权，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则退让妥协，欲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而在1919年7月25日，取得胜利之后的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对华宣言，称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并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主动废除沙皇俄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帝国主义列强与俄国苏维埃政权对待中国的态度与方式的鲜明对比，这无疑推动一批徘徊中的先进中国人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时，五四运动作为极大地促进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冲击和荡涤着几千年来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的广泛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2页。

传播开辟着道路。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青年和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中国、看世界，从对各种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的鉴别中认真思考。一批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历史的比较和实践的选择，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它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就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中国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并使社会主义思想成为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1〕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联合发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行为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不仅展现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而且锻炼了一批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先进分子，为思想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机遇。因为此时的思想领域除了马克思主义，还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主义”，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2〕。这些“主义”的支持者们一方面纷纷借助各种报刊杂志，如《每周评论》、《新潮》、《星期评论》、《建设》、《少年中国》、《曙光》、《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湘江评论》等，用中国的语言加以转换和宣传，分析如何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困境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这些“主义”的支持者组建各种社团，吸纳成员，宣传各自的“主义”，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工读互助团”、“文化书社”、“利群书社”和“新学生社”等。面对形形色色“主义”的冲击，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一时难以区分和辨别哪一种“主义”才能真正引导中国人民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与五四运动中北京政府的腐败、懦弱与反动，让更多的中国人相信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面对各式各样的“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通过与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的论战和正面交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

第一次论战是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留美归来的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并连续发表了三论和四论问题与主义，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能够指导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由此引发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发表《再论问

〔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33页。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题与主义》加以驳斥，陈独秀与瞿秋白等人也纷纷撰文进行批驳。双方在论争的过程中，各自阐明了自己支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由此在论争中扩大了影响，让更多中国人明确了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革命，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第二次论战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1920年，张冬荪发表了《现在与将来》一文，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实业来挽救中国，鼓吹在工会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来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反对国家的阶级性以及阶级斗争等理论，反对在中国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921年2月，梁启超发表了《复张冬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支持张冬荪的观点。对此，陈独秀、李大钊和李达等人借助《新青年》和《共产党》等刊物发表文章进行驳斥，阐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改良主义，是要将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中国的现实出路，从而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基础。第三次论争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1919年5月，黄凌霜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用无政府主义来批驳马克思主义；同时，区声白也著书立说，写下《无政府革命方略》一书宣传无政府主义。对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针锋相对，发表了《谈政治》、《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进行批驳，并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引导一批误信无政府主义的群众改变立场，转而支持马克思主义。三次论战，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推手，有效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广度和传播深度。

在理论斗争的过程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先锋和领袖人物。李大钊是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十月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高度赞扬俄国的“十月革命”，支持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并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此外，李大钊还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向青年大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北方传播的领头人物，陈独秀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南方传播灵魂人物。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同时，他还依托《新青年》杂志，向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陆续主持创办了《劳动界》、《伙友》等刊物，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会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南陈北李”的共同努力和相互协作，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且缔造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依托，

翻开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篇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群体内展开，大众化的主要目标在于让更多中国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比较中选择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1〕}，但经过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马克思主义逐渐从众多“主义”中脱颖而出，同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切实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探索，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理论条件。总之，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的巨大成绩，使得它作为20世纪初来自西方的“舶来品”逐渐在中国土地上扎根、成长，展现出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

（二）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要是向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普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创建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得以展开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诞生出新成果，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他们在该时期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人员条件。经过筹备，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青年毛泽东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此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而孕育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1927年大革命失败，革命遭遇重大挫折，中国共产党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开始探索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余下的队伍落户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仅保留了革命的“星星之火”，而且在斗争中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基本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2页。

——毛泽东思想。在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的干扰下，毛泽东思想在土地革命中艰难成长和发展。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到抗日战争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纠正了“左”倾错误，在革命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推动着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伴随着毛泽东思想从萌芽、形成到成熟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向共产党员、普通官兵和革命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在事实上开始了毛泽东思想的大众化历程，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正开端，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一次党内思想大解放，也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开始之初，整风运动主要是针对党内广大党员干部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促使党内形成对毛泽东思想的一致认识。但随后，整风运动超出了党员干部的范围，开始覆盖普通官兵和革命群众，这是在党的武装力量控制的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毛泽东思想宣传普及活动，切实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毛泽东思想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继续深化发展。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撕破和谈的伪装，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以毛泽东为核心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独立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主权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且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这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划时代意义，毛泽东思想开始获得彻底“大众化”的政治保障和现实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其控制和影响的地域和人群中进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尚不具备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对象的“大众化”现实条件。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正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该时期，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一方面积极学习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参与的实践活动，也不是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而前苏联的历史与国情同中国差异较大，它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缺乏足够的经验借鉴。该

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和原则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提供了理论前提。借助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报纸、广播等媒介，毛泽东思想开始向广大的党员、官兵、青年学生和普通群众传播。更为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立的主权国家，顺利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国民经济建设捷报频传，这些成就为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提供了事实支撑，效果尤为显著。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普通群众对毛泽东思想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等思想为多数人所熟知；二是普通群众相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自觉抵制那些反对或怀疑毛泽东思想正确性的言论；三是普通群众高度支持以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局势判断出现失误，将国内主要矛盾错误的定位为阶级斗争，在1966年至1976年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损失。而在不正常的政治氛围中，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活动也出现了不少被扭曲的现象，如，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将是否支持毛泽东思想大众化活动作为个人政治立场的判断标准，将怀疑或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人视为阶级敌人进行打击等。这在实质上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造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较严重的混乱，负面影响延续甚久。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特约评论员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随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相继转载该文，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解放人们的思想起到积极作用，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另一方面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基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判断，针对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现状，果断地实施改革开放，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第二次结合的路径，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寻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新的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体系，它第一次较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精髓、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战略步骤、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统一祖国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了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种种旧观念，邓小平理论大众化过程中遭遇一些阻碍，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一些人对是否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怀疑。邓小平同志在关键时刻发表了南方谈话，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思想，推动了邓小平理论的深化和传播，坚定了党和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1992年召开党的十四大，首次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表述，并对其基本内容进行较为完整的概括，强调“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这就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邓小平理论的大众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9年6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与新一代领导集体继续在邓小平理论旗帜的指引下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生死存亡。“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道亟待解决的难题。2000年2月，江泽民听取了广东省委常委的工作报告后，发表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的讲话，正式提出“三个代表”的概念，随后经过不断完善，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大会一致同意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正式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直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党的领导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新的丰硕成果，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由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构成的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对象主要是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党中央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等文件。同时，在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展开“三讲”教育活动，持续至2000年底，着力从思想上武装中国共产党，将它建设成为一个始终保持先进性、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和团结各族人民战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各种困难险阻的优秀执政党。与此同时，该时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大众化活动继续展开。199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地位和指导意义；1997年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江泽民强调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199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1999年，中央先后就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专题举办研讨（究）班；2000年底，全国各地陆续展开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到2002年5月基本结束。这些不同规模的、有组织的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中国人民在新千年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的同时，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也暴露出种种问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是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科学

〔1〕 夏子贵、毕国明、李国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8页。